

甲骨文与殷商史

王宇信

主编

第三辑



王宇信主編

甲骨文與殷商史

紀念胡厚宣先生八十壽辰專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甲骨文與殷商史

(第三輯)

王宇信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由省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吳縣文化印刷廠印刷

開本787×1092 1/16 印張36.5 插頁1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500

ISBN 7-5325-1076-x

K·107 定價： 16.00 元



胡厚宣先生近照（1988）



胡厚宣先生和他早期的幾個研究生（1989）

（前面坐者）胡厚宣

（後排左起）范毓周 王宇信 齊文心 裴錫圭 宋鎮豪



胡厚宣先生和《甲骨文合集》編輯組的同仁（1988）

（前排左起）謝濟 王貴民 胡厚宣 孟世凱 蕭良瓊 牛繼試

（後排左起）彭邦炯 羅琨 王宇信 張永山 齊文心

常玉芝 楊升南（以上均為胡振宇攝）

甲骨學研究的發展與胡厚宣教授的貢獻

——為慶祝胡厚宣師八十壽辰而作

一八九九年殷墟甲骨文的發現，是我國近代學術史上的重大事件。訖至目前，九十年來共出土甲骨文十五萬片以上。誠如胡厚宣先生所言：這麼多甲骨，「每片平均，就以十字計算，已經是一百六、七十萬言了。在這短短的五十年間，從前孔子所嘆為文獻難徵的商代的直接史料，竟發現了一百六七十萬言之多，這能說不是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一件驚人的盛事麼？」^①。

「古來新學問之起，大都由於新發現。」^②這些暴睛鼓眼、詰曲聱牙的殷墟甲骨文，經過我國和世界的幾代優秀學者，諸如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董作賓、于省吾、胡厚宣等學者的努力和追求，甲骨學研究經歷了它的發展道路上的草創時期（一八九九至一九二八年）、發展時期（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深入研究時期（一九四年至現在），並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甲骨學以它對中國古代文明研究的特殊作用，引起了更多外國學者的重視，愈來愈成為一門「國際性」的學問。而在甲骨學形成和發展的九十年歷史上，許多前輩大師的宏文巨著，為甲骨學研究奠定了基礎；這些宏文巨著也和甲骨文一樣，字字珠璣，成為值得借鑑和繼承的人類共同文化珍品。

胡厚宣先生自一九三四年北京大學史學系畢業後，被選入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並於一九三四年十月參加了第十次殷墟大規模科學發掘工作。在一九三

五年三月，他又參加了第十一次殷墟科學發掘工作，親執鋤鏟，主持了一〇〇四號大墓的發掘。著名的牛鼎、鹿鼎，就由他發掘面世。經受了嚴格的科學考古發掘工作和器物整理訓練以後，他又以全部身心投入了整理殷墟科學發掘所得甲骨的工作。胡厚宣先生五十七年來，孜孜不倦地研究和探索殷商文化，已出版專著、論文一百六十餘種，成為在國內外享有盛譽並受到尊敬的甲骨學一代宗師。

在胡厚宣先生八十華誕（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即將到來之際，我們重溫他博大精深的學說，就更會認識這位科學巨匠在甲骨學發展史上所佔有的重要地位。認真總結和認識胡厚宣先生在甲骨學研究發展和深入時期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對我們繼承和發揚我國老一輩學者創造的寶貴文化財富和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功立業具有重要意義。

一、一聲裂帛驚天下

一八九九年殷墟甲骨文被王懿榮等學者發現並開始有意識地購藏以後^③，一九〇一年出版了第一部甲骨著錄《鐵雲藏龜》，一九〇三年著名學者孫詒讓完成了第一部研究著作《契文舉例》^④。其後，一批甲骨著錄專書，諸如《前》、《菁》等陸續出版。但直到一九一四年羅振玉的《殷墟書契考釋》問世，才改變了甲骨文的「書既出，群苦其不可讀也」的狀況^⑤。正是由於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葉玉森等學者的不懈努力，不少甲骨文字被釋讀出來。在此基礎上，學者們開始用甲骨文研究商代史。王國維一九一七年所撰《殷卜辭中所見商先公先王考》及《讀考》，就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因此我們說，「甲骨學研究所經歷的識文字、斷句讀階段，再加上初期研究

者對它出土地的探尋、甲骨文的時代和安陽小屯村為殷墟的確定，大致經過了三十多年。由於大量甲骨資料的積累、著錄和研究，甲骨學已初具規模，完成了它的『草創時期』」⁽⁶⁾。

自一九二八年開始，大規模的殷墟科學發掘工作前後共進行了十五次之多，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不僅科學發掘出土了二七六七四片甲骨文⁽⁷⁾，而且還發現了豐富的遺址和遺物，為我國考古學研究奠定了基礎⁽⁸⁾。甲骨學大師董作賓先生，就是在一九二八年主持殷墟發掘工作時，解決了他「時時刻刻在苦思冥索，要找出一個可以判別卜辭年代的方法」問題⁽⁹⁾。經過充分醞釀，他提出了甲骨文分期斷代的十項標準和五期分法，從而澄清了晚商二百七十三年甲骨文的一團渾沌。他在一九三四年發表了《甲骨文研究斷代例》，把甲骨學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峯。而第十三次發掘所得YH一二七坑所得一七〇九六版甲骨，不僅數量為歷年出土最多者，而且現象十分豐富，大大開闊了學者們的眼界⁽¹⁰⁾。

我們在總結這一時期甲骨學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時，曾指出：「甲骨學研究也開始突破前一時期傳統金石學的局限。以董作賓為代表的一批甲骨學者用更為鎮密和科學的方法論分期，探商史，說卜法，探文例，把甲骨學研究提高到了新水平。」「在甲骨學研究取得長足進步的第二時期……也即甲骨學形成和發展的關鍵時期，自然是建樹較多的郭沫若、董作賓和其後的于省吾、胡厚宣、陳夢家等學者『衆領風騷』，成了甲骨學壇的『中心人物』。」⁽¹¹⁾

就是在這一時期，「襄年讀書於北京大學」，「每感書闕有間，文獻難徵」的胡厚宣先生，在參加了第十次和第十一次殷墟科學發掘工作以後，轉入了整理第一至第九次

發掘所得甲骨和一二七坑甲骨文的工作，並步入了甲骨學和文學研究的殿堂。他抱着「對甲骨文字作一通盤總括之徹底整理」的決心⁽¹²⁾，做完了《殷墟文字甲編釋文》，並就一二七坑的豐富材料和現象，寫成了一系列富有創見的論文。《甲骨學商史論叢》（初、二、三集），就是胡厚宣先生在這一時期的力作。此書與董作賓先生的《斷代例》前後呼應，把甲骨學研究又推向了一個新高潮。

《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共四冊，一九四四年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出版。初集一冊收入《殷代封建制度考》、《殷代婚姻家族生育制度考》等。初集二冊收入《殷代吉方考》、《殷代之天神崇拜》、《殷代年歲稱謂考》、《「一甲十癸」辨》、《甲骨文四方風名考證》、《論殷代五方觀念及中國稱謂之起源》等。初集三冊收入《卜辭下乙說》、《殷人疾病考》、《殷人占夢考》、《武丁時五種記事刻辭考》等。初集四冊收入《殷代卜龜之來源》、《卜辭地名與古人居丘說》、《釋死》、《廈門大學所藏甲骨文字》、《讀〈曾毅公君殷墟書契續編校記〉》、《甲骨文發現之歷史及其材料之統計》等等；《論叢》二集上、下兩冊。上冊收入《卜辭中所見之殷代農業》、《氣候變遷與殷代氣候之檢討》、《甲骨學緒論》、《甲骨學類目》等；《論叢》三集為《甲骨六錄》，收入中央大學、華西大學、清暉山館、曾和窖氏、雙劍謬于氏等六家所藏甲骨六七〇片，每片甲骨都附有摹本並作有考釋。

胡厚宣先生的《甲骨學商史論叢》一書，是他擬撰寫的《甲骨文字學》、《商史新證》等宏偉計劃的「軌始之工作」。胡厚宣先生歷來主張「欲免斷章取義，穿鑿附會之嫌，則所見材料必多」。為此，他在當時經濟並不十分寬裕的情況下，「已出版之書，必設法購置；未出版之材料，知其下落者，必輾轉設法，借拓鈎摹。國內國外，

公私所藏，雖一片不遺，雖千金莫惜。而中央研究院先後發掘所得大版碎片近三萬，以工作關係，玩之尤為熟悉。迄今所得見之材料，約七、八萬片，以視全部材料，所差不過十之一、二或二、三而已」。《論叢》一書，就是他在當時所能見到的已出版的四十三種甲骨著錄和尚待刊佈的二十二種甲骨拓本，特別是前中央研究院所得大批新材料的基礎上完成的。因此，《論叢》一書，不僅囊括了當時人們已著錄的傳世甲骨材料，還涵括了很多人們所罕見的科學發掘資料，是一部集當時甲骨文材料之大成的巨著。

胡厚宣先生的《論叢》一書，涉及了甲骨學商史研究的各個領域。從上列各集篇名我們就可以看出，在商史研究方面，他不僅論述了商代社會的經濟基礎農業生產的發展，而且還論及了商代社會的上層建築領域，諸如封建制度、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天神崇拜等等方面。而對商代社會的科技文化，諸如天文曆法、氣象和醫學也進行了探討；在甲骨學研究方面，胡厚宣先生對記事刻辭、卜龜來源、文字釋讀、校對重片等方面也有所論述，並對甲骨學史也進行了總結。特別是他還刊佈了傳世甲骨，為學者們的研究提供了新資料。胡厚宣先生《論叢》中的許多精譬見解，是在研究了大量甲骨文材料的基礎上得出的，因而經受住了時間的檢驗。直到現在，這部甲骨學商史研究的百科全書式的巨著，還有重大的參考價值。

《論叢》一書，在不少地方糾正了前人的錯誤。如《殷代焚田說》，推翻了前人「謂殷人為使用燒田耕作法」的成說，根據大量甲骨文材料，得出了「焚」字應為「殷人常燒草以田獵」的結論。特別是他列舉了《乙》二五〇七的一條材料，使其結論鐵案無移；胡厚宣先生在《卜辭下乙說》中考定「下乙」為殷代名王祖乙，而非前人

所論的地名；胡厚宣先生在《年歲稱謂考》一文中，列舉了稱「歲」卜辭十二例，稱「祀」卜辭三十二例，稱「年」卜辭六例，從而論證了商代歲、祀、年通稱，以充分證據糾正了羅振玉、董作賓等學者墨守《爾雅·釋天》「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的金科玉律，說商代無年、歲之稱的誤說。如此等等。

《論叢》一書在不少地方還發前人之所未發，或對前人成說有所補苴和深化。胡厚宣先生在《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中，不僅論證了商代早、晚婚姻制度的不同，還論述了商代已有宗法制度和求生典禮及生育之神，當時已有重男輕女觀念和子子命名制度等等；《殷代封建制度考》一文，則論述了周代五等爵的來源、畿服說的演變等。還指出了殷代制度與周代基本相近，周代各種制度當濫觴於商代，並非如前人所言殷周之際變動劇烈；胡厚宣先生在《五種記事刻辭考》及《卜龜來源》等甲骨學論文中，則對當時所能見到的五種記事刻辭材料進行了綜合研究，不僅解決了前人的種種爭論，還考證了商代採集與貢納龜骨的制度，談及商代的南北交通問題等等。在《釋死》一文中，分析了有關「死」字的卜辭七十七條，論證確為「死」字，使孫詒讓、商承祚、丁山等學者關於此字考釋的是是非非有了明確的結論；而《廈門大學所藏甲骨文字》、《甲骨六錄》等，則每有新字及不常見之成語。《讀卜曾毅公君殷墟書契續編校記》一文，不僅訂正曾書之誤三十一條，還補校出《續編》與其它書相重的三百二十八條；此外，還對甲骨文的辨偽也作出貢獻。如《四方風名考證》，據《乙》四五四八十四七九七十四八七六十五一六一論證了劉體智善齋舊藏四方風名大骨（即《京》五四〇）不偽。如此等等，不僅為甲骨學研究增加了很多新資料，也為學者使用材料提供了很多方便。

《論叢》一書，依據甲骨文的研究，還證實了我國古書中有不少記載是可信的。《四方風名考證》等論文，論證了「自來多數學者所視為荒誕不雅馴之言」的《山海經》、《夏小正》、《堯典》等文獻，「其中有不少的地方，亦確有遠古史料之依據」⁽¹³⁾。因此，胡厚宣先生的《論叢》一書，不僅充分「發掘」了甲骨文的史料價值，而且通過甲骨文這種商代社會的第一手資料，又「發掘」和印證了我國古文獻的重要價值。

上述諸端，僅是舉華要者。《論叢》一書中的許多科學創見，都為學術界所公認並產生了深遠影響。《論叢》初集從一九四四年出版以後，被教育部學術審議會授與「著作發明貳等獎」，獎金八千大洋。日本愛知縣大學教授內藤寅申評價此書時，說它「不是通史，但幾乎包含了殷代史的主要方面，確可稱為殷代研究的最高峰。由於此書，一舉而確定了胡氏在甲骨學界的地位，與王國維、董作賓先生並而成為三大甲骨學者之一」⁽¹⁴⁾。正由於胡厚宣先生《論叢》一書對甲骨學發展時期所做出的重大貢獻，所以日本著名古史專家白川靜教授在一九五三年高度評價此書是「斯學（按：即甲骨學）空前的金字塔式論文集，是繼董先生《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之後的又一劃時代的著作」⁽¹⁵⁾。

不寧唯是。胡厚宣先生在煌煌巨著《論叢》以外，還撰寫了不少研究論文和出版了甲骨書刊多種，涉及了甲骨學研究的各個方面。這些重要論著與《論叢》相輔相成，互為表裏，推動了這一時期甲骨學研究的發展。

在甲骨文的卜法文例方面，胡厚宣先生繼董作賓先生一九二九年《商代龜卜之推測》和一九三六年《骨文例》二文之後，也於一九三九年發表了《卜辭雜例》、一九

四七年發表了《卜辭同文例》等，在董作賓先生基本論定了龜甲和獸骨上的文例以後，又有所突破，對「甲骨文例多有補苴和深化」。而在此以前，雖然一九二八年胡光輝氏發表了《甲骨文例》一書，但此書所談龜甲的左右「然實則違於習慣」，而且書中「一則不別常例與例外；一則綱目不清，徒使讀者對於契文，益增繁難之感」⁽¹⁶⁾。因此，胡光輝雖然較早地研究了甲骨文例，但未能洞其奧隱以通闇隙，因而實用意義不大。經過董作賓和胡厚宣先生等學者對甲骨文例的研究，才「使看來錯綜複雜、『漫無章法』的卜辭，還原為劃然有序並繫連清楚的卜辭了」⁽¹⁷⁾。

在甲骨文的搜集、著錄方面，胡厚宣先生也取得了新成績。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以後，殷墟科學發掘工作被迫暫時停止。此後一直到抗戰勝利，安陽殷墟的私盜掘甲骨之風又起，不少甲骨或流散國外，或散落北京、上海等地。為了搶救這一批寶貴文化財富，胡厚宣先生不辭辛苦，在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不久，就由大後方成都飛往北京、天津等地，調查並搜集甲骨文資料。此後，又於一九四六年去上海、南京等地調查收集甲骨文資料⁽¹⁸⁾。其中一部份材料，收入一九四六年出版的《戰後平津新獲甲骨集》一書。特別重要的是，就是在這部書裏，他開創了甲骨學著錄編纂的「先分期，再行分類」的體例，並在其後出版的《寧滬》、《京津》、《續存》等幾書中一以貫之，從而為傳世甲骨的著錄提供了範例。因此，在甲骨文材料的搜集和刊佈方面，胡厚宣先生也作出了很大貢獻。

正是由於胡厚宣先生在研究工作中，「期能綜合歸納，分析疏通，著筆之前，必先將有關材料網致無遺，悉參於前人之說，然後旁印之史乘舊說」⁽¹⁹⁾，所以他寫出的一系列科學論著石破天驚，震聾發聩，在學術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著名史學

大師顧頡剛先生盛贊胡厚宣先生的論著是「一聲裂帛驚天下」，充分肯定了他在甲骨學研究的「發展時期」所做出的卓越貢獻。

二、《合集》書成蔚似林

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的甲骨學研究進入了深入發展時期。這一期，「以《甲骨文合集》為代表的著錄書的出版，標志着集中材料、整理材料、公佈材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從而「為甲骨學和殷商史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②。

而胡厚宣先生作為《甲骨文合集》的總編輯，無論是材料的搜集和集中，還是該書的總體設計和編輯體例方面，以及具體的去重、弁偽、綴合、選片，甚至版面的安排等等，事無巨細，他事必躬親。可以毫不誇大地說，他既是《合集》編輯組的一名普通成員，又是該書的總設計師。

《甲骨文合集》這一國家重點科研項目，是由胡厚宣先生所提出，並得到當時歷史研究所的領導，特別是尹達先生的支持。好事多磨。從一九五六年《甲骨文合集》項目被列為國家重點科研項目以後，直到一九八二年全書十三巨冊出齊，這期間經歷了不少風風雨雨，時停時作，歷時二十六個年頭。這部被譽為「甲骨學史上里程碑」式的集大成巨著的完成，與胡厚宣先生的百折不撓的精神是分不開的。是他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在祖國南北各地搜訪甲骨文工作的繼續。

早在一九五一年就出版了胡厚宣先生的《戰後寧滬所獲甲骨集》和《戰後京津所獲甲骨集》等一批甲骨著錄。這些甲骨著錄書的出版，凝聚了胡厚宣先生抗戰勝利以後，在各地搜訪甲骨文的汗水和心血。可以說，上述三書的出版，是新中國大規模集

中材料、整理材料、刊佈材料的「序幕」。

胡厚宣先生一九五六年奉調北京以前，任教於復旦大學。為了搜訪甲骨文，他經常放棄休假，利用寒暑假到各地探訪甲骨。我們不妨列一下他二年的行程，就可以發現他的奔走祖國各地的匆匆身影。他一九五三年春到蘇州，當年夏又到華北各地。一九五四年春到杭州，當年夏又到長春，國慶期間又去了南京……每到一處，他「於公私所藏，續有所見，隨手描錄，或施墨拓，日又漸積，就多了起來。略加整理，我想還是把它發表出來，好供大家研究的方便」⁽²²⁾，這就是一九五五年出版的《甲骨續存》一書。該書收入甲骨三七五三片，匯集了全國各地不少甲骨的精品，為甲骨學商史研究提供了不少新資料。

胡厚宣先生解放以後尋訪甲骨的足跡，大大超過了他在抗戰勝利以後的活動範圍。因此，通過他多年孜孜不倦的追求和探訪，國內外公私藏家的傳世甲骨一宗宗、一件件的來龍去脈他都爛熟於胸。而胡厚宣先生《甲骨續存》一書的完成，為他日後總編輯《甲骨文合集》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可以說，這是新中國對甲骨材料進行大規模的集中、整理和刊佈工作的「準備階段」。

一九五六年《甲骨文合集》被列為國家重點科研項目，這是中國科學事業發展的需要。這首先是為了「將八十多年來出土的甲骨資料盡可能完全地提供給學術界，以供進行多學科研究，充分發掘我國歷史上的文化珍品，是非常必要的」。其次，一九五三年第一部甲骨著錄《鐵雲藏龜》出版以後，不少著錄出版早，印數少。或在國外出版，傳入國內更為罕見。「這種種情況，給研究者利用甲骨文材料帶來了很大的困難」。「為適應研究需要，也急需出版一本資料齊備的《甲骨文合集》」⁽²³⁾。其三即

使能見到的一些早年出版的甲骨著錄，有的印刷不精，文字模糊難辨，或摹寫失真，字體常有錯誤。也有的將拓本分條剪割，或將一骨正反分開。而且有的著錄書，重片迭出，使材料顯得十分龐雜。「對已著錄的甲骨，進行一次全面的科學整理，出版一部科學性強的《甲骨文合集》，對甲骨學和其它學科的發展，都是非常迫切的」⁽²⁴⁾。其四，雖然歷年已著錄甲骨近十萬片，但還有不少未見出版。「盡可能地將那些尚未著錄的材料公佈，也是《合集》一書編纂目的之一」⁽²⁵⁾。

不少學者深知，編纂一部甲骨文合集，對發展學術事業是十分重要的。甲骨學大師董作賓早就希望，「首先應該把材料集中，把所得十萬甲骨，匯為一編」⁽²⁶⁾。台灣和香港的學者也在做這方面的工作。嚴一萍曾擬採取「名歸主人之辦法」⁽²⁷⁾，編纂《甲骨集成》。但是，限於條件，只出了一集，沒有能繼續編輯下去。一直到《甲骨文合集》出版以後的第三年，才在《合集》的基礎上，重新編輯了《商周甲骨文總集》十六冊出版。確如胡厚宣先生所深刻指出的：像《甲骨文合集》「這樣規模的較全面的學術資料工作，決非個人或少數人所能為力的」。「若不是我們這樣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沒有黨的正確領導，像這樣一項大型的工作，無論如何是作不成的」⁽²⁸⁾。

《甲骨文合集》既不同於一部有骨必錄的「全集」，也不同於只擇其要的「選本」，而是一部能涵括十萬片甲骨中對商代歷史文化有研究價值的甲骨材料總集。所收四十九五六片甲骨，先行分期，每期內再按內容進行分類處理，因此綱舉目張，查找材料頗為便利。特別重要的是，《合集》的分期處理雖然仍採用董作賓的「五期」學說，但將董氏所認為是第四期「文武丁時代之謎」的一批甲骨，按字體分為甲、乙、丙三組集中編排於第一期附，以供學者進一步研究討論。嚴一萍指出：「在十萬片甲骨中

理出『武丁時期附』的一部分，是要有『觀其全體』的甲骨研究工夫，決不是隨便『剪剪貼貼』可以做到的。」⁽²⁹⁾這對甲骨學深入研究時期關於分期斷代研究的深入進行很有意義。

不僅如此，《合集》在集中甲骨文材料時，首先是把當時已出版的一八〇種甲骨著錄收齊，再廣泛調查收集全國各地的甲骨實物或拓本。而流散國外的甲骨，也盡力搜集拓本或照片。為此，胡厚宣先生身先士卒，帶領合集編輯工作組的青年學者，在三年困難時期「『南征北戰』，幾乎跑遍了全國，確實花了不少時間和精力」⁽³⁰⁾。編輯成書時，盡可能採用原骨新拓本，並把一骨的正、反集中，並進行了校重、弁偽、綴合、集中同文等一系列科學整理工作。在編纂《合集》過程中，「僅就著錄書粗略統計，共校出重片六千多片，重片次達一萬四千多」，「對舊著錄書作了一次清算」⁽³¹⁾，這是前無古人的繁重工作。而綴合甲骨，能使「不少看來並無太大意義的殘碎甲骨，在復原後產生了使人意想不到的學術價值」。「綴合工作是對甲骨文學術價值的『再』發掘」⁽³²⁾。《甲骨文合集》非常注意斷片的綴合，共收入綴合版二千多，其成果超過了前人。

因此，《甲骨文合集》一書的出版，是對八十多年來殷墟出土甲骨文的一個總結。從此，改變了研究資料匱乏的局面。近年來，甲骨論著較《合集》出版以前，無論在數量方面還是質量方面，都有較大的增長和提高，促進了新時期甲骨學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可以說，《合集》一書繼往開來，是一部甲骨學史上的里程碑式著作。而做為總編輯的胡厚宣先生，對這一時期甲骨學研究的發展所做出的巨大貢獻是不言而喻的。雖然總編輯《甲骨文合集》，耗費了胡厚宣先生不少精力，但他在這一時期仍然完成